



走向世界

中國人考察和
記述西方的歷史

鍾叔河 著

著者說明

《走向世界》，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初版，有副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台灣百川書局一九八九年據此印行繁體直排本），二〇〇〇年再版，二〇一〇年三版時，副題改為「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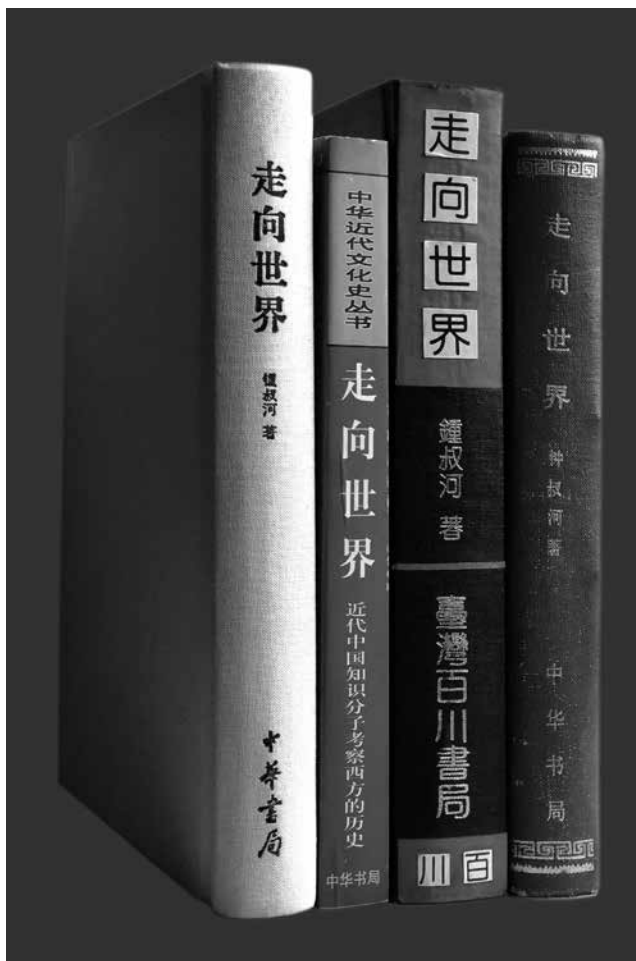
原書二十三章，前三章概述古時中西（中日）交通的歷史，後二十章分別論說一八四七至一九〇七年五十年間自林鍼至錢單士釐旅西（旅日）諸人的記載和影響。現將寫張德彝的原第七和第十一兩章移入《從東方到西方》，改寫成「張德彝的八次述奇」輯中的第一、二、三篇，存二十一章。

此次還對全書各章進行了或多或少的增補，並訂正了某些誤植失校之處。如第一章「地生羊」表中的「洞女禁限」和「古龜慈王」，便改正為「洞女葉限」和「古龜茲王」了。

原有錢鍾書序，仍置於卷首；李侃序係因《中華近代文化史叢書》而作，叢書未成，今即移去。原有代跋《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的》，亦移入《從東方到西方》書中。

二〇二一年三月 鍾叔河

[圖一] 走向世界的四個版本



右起 (一)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 (二) 台灣百川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三) 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 (四) 中華書局二〇一〇年版

[圖二 / 圖三] 錢鍾書多次修改序文

叔河先生：閣下親手跡異於往日，即中心
愛惜，滄至若此，要出，愚也。步推排后
惟祝大難已過，大禍收矣，坐臥不安
調養。才老若為人作序，世所共知，若
為文得倒，聊示微意。兩週未人事，帽集
物空名，寧就上，徒同語。如認為有用，
甚即信身，若係同老一詞，仍無干碍。取
由，必以形勢，逼空，強詞，或為大外，原
勢，而原中，中，一浪，因，忘，知，忘，百忙中，作
意，和，為，情，即，性
鍾書
上
二月廿五年

《走向世界》序

君最近以《讀》寫了鍾叔河同志《走
向世界》的文章，感到興趣，也起了疑。差
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語寫一本有關晚清輸
入西洋文學的小文，曾涉獵叔河同志所譯的
那一套書，當時它們已是冷門東西了。我的視
野很小，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著眼，
隨處則談，兼以日本文化的全面，更不
別說，我對這套書，也~~不~~他那样耐心地搜
訪，塵心地瀏覽。~~他~~余白時，就來過
的田福片經向他請教，并~~不~~
能也快快完成《走向世界》的編校計
劃。第一項和君談起《走向世界》的文章，
表示贊許；晚清文獻也屬一環，同志的博學
的範圍，他的意見不同沒法。對中外文化文

二

流史喜有研究的李說同志，也很重視叔河同志的
文章和規劃。君稱道，由於他們兩位的天才勉
勵，叔河同志雖然工作~~不~~伴不很順利，身體情
況更甚艱苦，而又提解，又校訂，又寫序文，
不到二年，竟大功~~告~~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近用說！難道有可能走出世
界嗎？我們不情不願，~~也~~只好走何這世界，因
為~~我~~無法走出，這這世界，即使用腳生了眼。
中國《走向世界》，事實上也是“世界”“走向”
中國；咱們開門出去也由於外面有人敲門，
撞門甚至破門進來。“開門自強”“門戶開放”
那種簡括利落的公式語，很便了記憶，作
為標題或口號又有用也。但~~是~~歷史過程任
任不為歷史編寫者的方便着現，~~也~~況不看重
截了當地，培步就班地推進。在我們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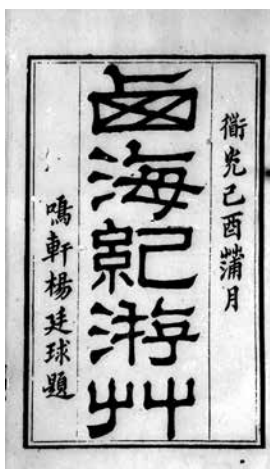
三

活里，有時門和窗未開，有時并或半開了窗卻
窗未開，有時門和窗都閉了，只留下窗簾和牆
紙孔透些光亮；門窗開不開得不像風着涼，
門窗閉不開不暗會窒息。文化交~~是~~是也可以打
這種家常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這
一系列文章，中有玩思，不僅增進了我們的知識，
而且仍能引起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錢鍾書
1914年3月。

(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寄來序文第一稿 (三頁)

[圖四] 林鍼、斌椿和志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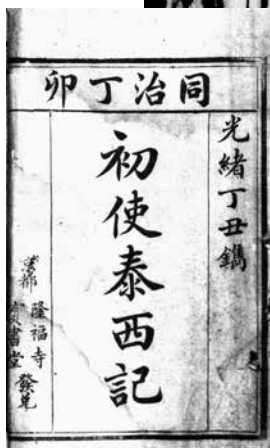
(上) 林鍼《西海紀游草》



(上) 斌椿《乘槎筆記》



(上) 志剛(左六)與張德彝(右四)，中立者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左) 志剛《初使泰西記》記述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各國經過

[圖五] 羅森、容閔、王韜、李圭



(上) 羅森一八五四年隨船至日本 (當時日本人的寫真)



(上) 容閔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時的攝影



(上) 海外漫遊 (一八七〇) 回國後的王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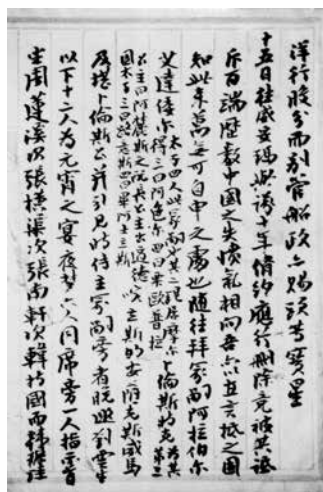


(上) 李圭一八七六年參觀費城世博會的實錄

[圖六] 郭嵩燾、劉錫鴻和曾紀澤



(上) 郭嵩燾
(郭劉曾三像均為英國銅版畫)



(上) 郭日記一頁，記與英人議「條約應行刪除」，「憤氣相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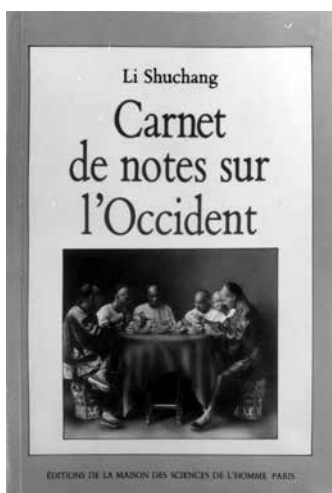


(上) 劉錫鴻



(上) 曾紀澤

[圖七] 黎庶昌、徐建寅、薛福成、黃遵憲



(上) 黎庶昌《西洋雜誌》法譯本



(上) 徐建寅



(上) 薛福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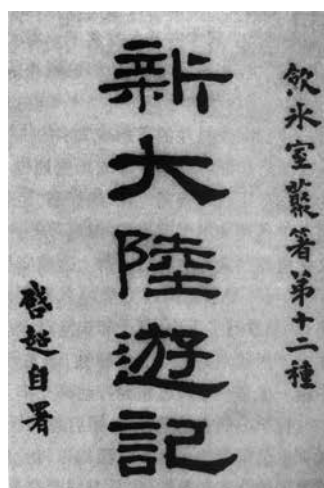


(上) 黃遵憲

[圖八] 康有為、梁啟超和錢單士釐



(上) 康有為《歐洲十一國游記》



(上)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



(上) 錢單士釐晚年在北京



(上) 《癸卯旅行記》日譯本

目 錄

錢鍾書序	001
第一章 古人的世界	003
善眩之國	003
SIREN 與甘英	006
大食的戰俘	009
地生羊	012
第二章 自西徂東	017
馬可·波羅	018
「下西洋」	021
《萬國輿圖》	024
《職方外紀》	028
十七世紀的夢想	032
第三章 一八四〇年以前	037
巴瑣馬西行記	037
樊守義《身見錄》	040
謝清高《海錄》	046
第四章 林鍼始遊西海	052
比徐霞客走得更遠	053
從坐井觀天到以蠡測海	055
思鄉不羨寄居蟲	059

第五章	斌椿遊歷歐洲	063
	出洋的背景	064
	久有浮海心	067
	非親到不知有此勝境	069
	東土西來第一人	073
第六章	志剛初使泰西	077
	跪拜禮	077
	夜郎自大	080
	蒲安臣使團的工作	083
	炮大船堅，不如此言	087
第七章	羅森見日本開國	091
	海外三神山	092
	花旗火船	095
	馬登·柏利和羅森	098
	炮口下的開放	101
第八章	容闈與西學東漸	105
	伶俐的小傢伙	105
	耶魯的留學生	108
	和太平軍的接觸	112
	幼童留美	116
	埋骨在 Hartford	120
第九章	王韜的海外漫遊	124
	墨海書館	125
	上書太平軍	129
	從香港到歐洲	132
	曾經滄海，放眼全球	137
	扶桑之遊	140

第十章	李圭的環遊地球	145
	痛定思痛	146
	百年盛會	149
	機器正當講求	152
	大清國展覽館	156
第十一章	西方文明與郭嵩燾	160
	孤獨的先行者	161
	大風吹颺洞庭波	165
	思想危機和出路	169
	洋務觀	172
	本末論	176
	巴力門和賈阿爾	179
	定大、虎克諸實學士	184
	從退夫子到比耕到紐登	187
	夷狄？中國？	191
	洋務派內部的批評者	194
	寂寞身後事	197
	「終為一中國人」	202
第十二章	劉錫鴻「用夏變夷」	206
	一場大辯論	207
	舞空槍於煙霧之中	210
	郭嵩燾的死對頭	215
	半推半就地認錯	219
	舊思想的破產	223
第十三章	黎庶昌記西洋風土	228
	出發點：經世之學	229
	一卷西洋風俗圖	232
	文人·學者·外交官	236

	於平實中見深意	240
第十四章	外交人才曾紀澤	245
	五千年未有之創局	245
	待憑口舌鞏河山	249
	一腔憤血	254
	曾國藩的影響	259
	由通西學而入洋務	263
	手書日記	269
第十五章	技術專家徐建寅	275
	西洋格致之學	275
	軍械所和機器局	278
	「定遠」和「鎮遠」	282
	遊歷各國工廠	284
	務實精神	289
	身殉科學技術	293
第十六章	薛福成的洋務思想	297
	洋務派的一顆新星	298
	北洋「籌洋」	301
	從防海到出使	305
	始信郭嵩燾之說	310
	富強之本原	315
	「君民共主」好	320
	非西人所得而私也	325
	稱使才者，並推薛曾	330
第十七章	甲午以前的日本觀	335
	何如璋《使東述略》	336
	李筱圃《日本紀遊》	343

	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餘紀》	347
	黃慶澄《東遊日記》	352
第十八章	黃遵憲的日本研究	359
	不僅僅是詩人	360
	草完明治維新史	362
	變法與民權	366
	劫餘驚撫好頭顱	370
	千秋鑒借《吾妻鏡》	374
第十九章	康有為的不懈追求	379
	洪水猛獸——思想導師	380
	公車上書	385
	以日為師，以法為鑒	389
	神農嚐百草	393
	《意大利遊記》	398
	《法蘭西遊記》	402
第二十章	啟蒙思想家梁啟超	408
	決然捨去舊學	409
	西學和變法	412
	日本之學	417
	從真理再向前跨	422
	夏威夷和澳洲之行	428
	新大陸	434
第二十一章	第一部女子國外遊記	442
	從閨房走向世界	442
	啟蒙女性	446
	以國民自任	449
	介紹西國藝文	454
	文和詩	457

年 表	462
後 記	468
附 錄	
「走向世界」叢書原序	470
人之現代化，漫漫其修遠 —— 「走向世界」叢書新序	473

錢鍾書序

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志為《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憶起舊事。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行記、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像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一些出洋遊歷者強充內行或吹捧自我，所寫的旅行記——像大名流康有為的《十一國游記》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談》往往無稽失實，行使了英國老話所謂旅行者享有的憑空編造的特權（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遠來和尚會唸經」，遠遊歸來者會撒謊，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叔河同志正確地識別了這部分史料的重要，喚起了讀者的注意，而且採訪發掘，找到了極有價值而久被湮沒的著作，輯成《走向世界叢書》，給研究者以便利，這是很大的勞績。李一氓同志和我談起《走向世界叢書》的序文，表示讚許；晚清文獻也屬於一氓同志的博學的範圍，他的意見非同泛泛。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視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為湖南的出版社所制訂的規劃。我相信，由於他們兩位的鼓勵，叔河同志雖然工作條件不很順利，身體情況更為惡劣，而搜輯、校訂，一篇篇寫出有分量的序文，不到三年，

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還用說！難道能夠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嗎？哪怕你不情不願，兩腳彷彿拖着鐵鐮和鐵球，你也只好走向這世界，因為你絕沒有辦法走出這世界，即使兩腳生了翅膀。人走到哪裏，哪裏就是世界，就成為人的世界。

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開門走出去，正由於外面有人推門，敲門，撞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閉關自守」「門戶開放」那種簡潔利落的公式語言很便於記憶；作為標題或標語，又湊手，又容易上門。但是，歷史過程似乎不為歷史編寫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當地、按部就班地推進。在我們日常生活裏，有時大開着門和窗；有時只開了或半開了窗，卻關上門；有時門和窗都緊閉，只留下門窗縫和鑰匙孔透些兒氣。門窗洞開，難保屋子裏的老弱不傷風着涼；門窗牢閉，又怕屋子裏人多，會氣悶窒息；門窗半開半掩，也許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對象」的半推半就。談論歷史過程，是否可以打這種庸俗粗淺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實，不僅能豐富我們的知識，而且很能夠引導我們提出問題。

錢鍾書

一九八四年三月

第一章

古人的世界

古人的世界，比起現代人來，確實要狹小得多。

二千三百年前，莊子作《逍遙遊》，寫大鵬自北冥徙於南冥，「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真可謂汪洋恣肆，想像力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可是，當他的筆鋒轉向人間世，寫到當時人們外出旅行的情形，卻是「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如此之「遊」，實在算不得甚麼「逍遙」。

莊子時代的一千里，大約相當於現代噴氣客機半小時的航程。為了走過這麼一段距離，包括做準備在內，竟得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試問：在那樣舉步維艱的情況下，人們怎麼有可能去想像和追求一個廣大的世界呢？

因此，生活在亞歐大陸東頭的中國人和西頭的歐洲人，在公元一六六年以前，一直沒有留下過直接接觸的記錄。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遙遠的西方從來不曾屬於他自己的世界；所有來自遠西的信息，完全是間接再間接的輾轉傳聞，每每和真相相差很遠。

善眩之國

撇開周穆王西征會見西王母之類的神話不說，信史所載最早向西方「鑿空」的中國人當是張騫（？一前 114）。《史記》云：張騫「身

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

大宛、康居都在今烏茲別克境內；大夏即 Bactria，為阿富汗北部古國；大月氏部族原遊牧於敦煌一帶，漢時亦西徙至阿富汗。張騫「身所至」限於這些地方，大約不出東經六十度。再往西，他就只能依賴「傳聞」了。

大月氏的西邊是安息，後稱波斯，今名伊朗。張騫具言：「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有市，民商買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應該說，這些「傳聞」還是比較屬實的，因為張騫親自到了大月氏，距安息還不太遠。

安息再往西數千里是條枝，即安息人稱阿拉伯為 Tajik 的對音，唐朝人寫作大食。距離更加遙遠了，「傳聞」就難免失實。張騫言條枝「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這些情況，有的固然還算屬實，有的就不那麼屬實了。對「弱水」和「西王母」的解釋，歷來說法不一，恐怕只能從神話故事中去找尋答案。

波斯和阿拉伯本是充滿神話故事的國土，是《天方夜譚》的故鄉，是地地道道的「善眩之國」。「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也就是「善眩」的一種表現。還是張騫這個中國人比較「務實」，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未嘗見」到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史記》又說，在張騫以後，漢朝「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安息國王並曾「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黎軒在後來的史籍中叫作大秦，又叫作海西國，後世學者大都認為係中國人對當時地跨歐亞兩洲的羅馬帝國的稱呼。抵黎軒的漢使並沒有留下記載。《史記》記下的這些國名，也可能出自傳聞。

所謂「善眩人」，就是會表演幻術的藝人。後來唐朝人杜佑（735—812）在《通典》中記述此事，稱善眩人為「幻人」，謂其容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張星烺先生遂據此云，「其為歐人已無可疑，……誠可謂為歐洲第一人足踐中華之土者」。其實，杜佑晚於司馬遷六七百年，未必掌握當時第一手資料。而現今出土的唐代「胡俑」，亦「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當係以居留長安的波斯人或中亞人為原型的，而這些人並不能稱為歐洲人。安息使者「獻於漢」的善眩人，恐怕只可能來自西亞，來自傳統的「善眩之國」。

事實上，無論在張騫身前，還是在張騫身後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和歐洲並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聯繫。漢使所到之黎軒，只可能是羅馬帝國在西亞的屬地。這些漢使不僅沒有留下材料，甚至也沒有留下姓名，於文化了無影響。中國對於歐洲，始終只有通過安息、條支等「善眩之國」輾轉傳聞得來的零星信息，如：

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跡在石上，皆如花形。（《別國洞冥記》）

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後漢書·西域傳》）

如果仔細研究，也可以從這些記述中找到某些真實的影子。「水精為柱」，也許指羅馬宮中普遍用作裝飾的玻璃。「飛橋數百里」，也許指著名的羅馬引水渡槽。但這些就像經過多次散射和折射的圖像，正如《後漢書》作者范曄自己所說，「譎怪多不經」了。

古人對於遠方世界的知識之缺乏，不只中國而然。希臘、羅馬之言東方，「滿紙荒唐」更有甚焉者。如希臘人克泰夏斯（Ctesias，公

元前 400 年)云：賽里斯(希臘文 Σηρης，拉丁文 Seres，係從「絲」字派生之詞，義為「產絲之國」，即指中國)人身高逾十三肘尺，壽逾二百歲。波桑尼阿(Pausanias，公元二世紀人)說：賽里斯人用小米和青蘆餵一種類似蜘蛛的昆蟲，餵到第五年，蟲肚子脹裂開，便從裏面取出絲來。……

Seres 之名，說明此時確有一條連接中國和歐洲的「絲綢之路」，但白里內(Gaius 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23—79)《自然史》說將絲綢「由地球東端運至西端」的，卻並不是中國人，而是西域、大夏、波斯、阿拉伯、腓尼基和希臘等國的行商。這些行商像接力一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轉輸交易，給羅馬的貴婦人提供「錦繡文綺」做衣料。至於「賽里斯人」，白里內稱其「身體高大，紅髮碧眼」，顯然只存在於商隊和好奇者的想像之中，羅馬城裏的居民包括白里內在內是從來沒有親眼見到過的。不然的話，他就不會這樣來形容「賽里斯人」了。

SIREN 與甘英

後於張騫兩百多年的班超(32—102)出使，代表了古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陸上的遠征。據《後漢書·西域傳》載，永元九年(97)，班超遣屬吏甘英前往「大秦(海西)國」，「抵條支，臨大海欲渡」，為「安息西界船人」所阻。《晉書·四夷列傳》記甘英被阻的情形云：

……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賣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甘英)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著者認為，船人所說能令往者思慕悲懷至於「不戀父母妻子」的

海中之物，當是希臘神話中以歌聲感人的巫女 Siren（周作人譯作「舍倫」）。請看英雄阿突修斯（奧得修）航海的經歷（用周作人譯文）：

……他須得路過舍倫們的島。這些是巫女，樣子像是鳥。她們唱得那麼美妙，凡是聽到她們的人都覺得不能不上陸去。她們坐在那裏一個平原上，唱着歌。周圍都是些人的乾癟的身體。他們走來聽，坐下聽着，直到他們死了為止。阿突修斯……把所有的人的耳朵都用蠟堵好了，叫他們聽不見甚麼。但是他自己卻想要聽，又要不受害。所以他叫他們把他縛在桅竿上，無論遇到甚麼事，都不要放他下來。

於是他們划槳前進。不久那舍倫們的可愛的歌聲聽得見了，阿突修斯掙扎着想要自由，對他們叫喊放他下來。但是他們只向前划，直至聽不到歌聲才算安全了。

Siren 的故事，從荷馬時代起，便在西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區廣泛流傳。而在古代人的觀念裏，神話和知識是很難加以區別的。「安息西界船人」未必有意欺騙甘英，他也許確實看到不少人駕船入海沒有返回，確實以為他們是被「海中思慕之物」迷住了。

康有為在《歐洲十一國游記》中，埋怨甘英不該放棄前往大秦的努力，他說：

甘英愚怯，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互數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則甘英之大罪也。其與哥倫布、墨志領、岌頓曲^①之流，相反何其遠哉。中國人而有此，至今國土不闢於大地，智

① 墨志領即麥哲倫。岌頓曲即發現夏威夷群島的克拉克（Clerke）。康氏係用粵語記音，故與通常譯法不同。

識不增於全球，遂以一切讓於歐人，皆英輩之罪也！

康有為把「中西互數千年不通文明」完全歸咎於甘英的「愚怯」，認為是甘英「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亦即他缺乏作為一個探險家的心理素質的結果，顯然有些過分。與其感情用事地埋怨甘英，倒不如用理智冷靜地分析：在上千年的中西交通史上，甘英之「臨大海欲渡」，何以繼之者蓋寡？如果後繼者不乏其人的話，那麼即使甘英「愚怯」，總還有其他比較不那麼愚怯的甘英吧！

只要是客觀地進行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安土重遷和閉關自守，乃是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的本質的表現。落後的生產方式，把人們牢牢地束縛在狹窄的地面上。宗法的、封建的、迷信的觀念，禁錮着人的頭腦，壓抑着人的精神，使人變得內向和保守。從學者們的「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官吏們的「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直到小百姓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這類古訓和格言深入人心，成了指導人們生活的法則。在甘英之後一千八百年，郭嵩燾出使英國，還有人譏之為「不容於堯舜之世」，惜其「何必去父母之邦」。這樣，又怎麼可能苛責一千八百年前的甘英呢？

而在西方，隨着貿易、航海和世界性宗教的興起，卻有利於形成一種外向和開放的性格。儘管中古時期歐洲的文化一般地說低於東方，但在走向外部世界這件事情上，卻不能不承認歐洲人的起步比中國人早。

後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一般譯作馬可·奧勒留）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大秦與中國，「始乃一通焉」。有學者以為，所謂「安敦遣使」，乃是在敘利亞的羅馬商人，循往印度的海路繼續東行，過印支半島時弄了一些當地土產，藉安敦的名義到中國謀求通商。不管這個推測是否屬實，歐人之至中國，總要比中國人到歐洲早得多。

從這次以後，正史記載西人之東來，還有：

公元二二六年（三國吳黃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論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謁孫權。

二八〇至二九〇年間（晉武帝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貢獻。

六三五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大秦景教「上德」阿羅本來到長安。景教為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在中國之名稱。阿羅本大約為敘利亞人，此為西方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始。

六四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唐太宗具國書回報，並回贈綾綺。隨後在六六七、七〇一、七一九、七四二等年均有來使。

一〇八一年（宋神宗元豐四年），拂菻王滅力伊靈改撒遣使來獻鞍馬、刀劍、真珠。一〇九一年（宋哲宗元祐六年），其使又兩至。

「自日南徼外」和「到交趾」，說明這些歐洲的商人和使者們，多是從海路通中國的。並非歐洲人的才智和勇氣一定高出甘英，只因為他們擁有比甘英多的航海技術和經驗，知道如何戰勝大海的風濤，也知道在海上其實並沒有 Siren 那可愛得可怕的歌聲。

大食的戰俘

「大秦王安敦」的使者來到中國以後，又過了將近七個世紀，才有一個中國人再次到達亞洲西境並留下可靠的記載。這個人之去西亞，既非出於自動，亦非受官方派遣，只因為他是阿拉伯人的一名戰俘。

杜佑《通典》卷一九一《邊防典·西戎總序》記下了這件事情：

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天寶十年即公元七五一年。是年，高仙芝統率的唐軍，在怛邏斯（在

今哈薩克斯坦南部) 被阿拉伯人擊敗，隨軍的杜環也就成了阿拉伯人的俘虜，被帶到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在今伊拉克境)，這裏離地中海也就是所謂「西海」已經不遠了。

唐朝軍隊是應中亞諸國之請去幫它們抵禦阿拉伯(當時叫大食)侵略的。在《全唐文》和《冊府元龜》裏，還保存有當時康國(今撒馬爾罕地)、安國(今布哈拉地)、石國(今塔什干地)、俱蜜(Comedi)和吐火羅(Tocharian)請援的表章。如康國王烏勒伽於開元七年(719)二月庚午遣使上表曰：

臣是從天主普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類奴。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為大國行裨益事。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鬥戰……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冊府元龜》卷九九九)

中國和西域——中亞諸國，有着悠久的文化聯繫。唐朝建立以後，從貞觀到開元都是「盛世」，政權統一，國力強盛，又進一步在西域—中亞擴大了自己的影響。那是一個中國人的自信心比較強，向外看得比較多的時期。

和隋唐大一統差不多同時，伊斯蘭—阿拉伯亦在西亞崛起。阿拉伯人於進攻君士坦丁堡受阻後，轉而向東方擴張，終於成為唐朝的勁敵。

中亞諸國本來多傾向唐朝，但高仙芝的貪婪橫暴，使事情轉向了反面。《舊唐書》記怛邏斯之戰的背景及唐軍敗績的情形云：

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為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於闐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群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

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眾為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

這一戰不僅是唐朝在西域開始喪失影響的轉折點，也是唐朝的國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戰後四年，安祿山擁兵稱亂，國家元氣在叛亂中受到了極大的斫傷，國力從此一蹶不振。不僅西域派遣軍被迫撤回，蕃軍蕃將反而成了左右中原政局的一大勢力，詩人們也重新詛咒起「開邊」和「遠略」來了。

杜環淹留異域凡十餘年，七六二年方得回國。儘管不是出於自願和主動，他的「經行」仍然有着重要的價值。可惜的是，《經行記》早已亡佚，沒有流傳下來。幸而杜佑在《通典》中記下了杜環的這番經歷，並且還保存了《經行記》的某些片斷，主要是關於大食（阿拉伯）及其屬國的記事，如：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其大食法者……不食獵狗驢馬等肉。

這些記述不再是得自傳聞，而是杜環親目所見的情事，所以十分真實，完全沒有虛幻的成分。值得指出的是：史籍所載大食使者來唐有三十六次，唐朝卻從來沒有使者到過大食。真正身歷這一西亞大國並且留下記述的唐人，恐怕就只有這個怛邏斯之役的戰俘了。

杜環的足跡，雖然只到達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地方，但這些地方跟拂菻（大秦）即地跨歐亞兩洲的東羅馬帝國已經比較接近。當時

拂菻和大食連年爭戰，在大食也一定會有拂菻戰俘，並且很可能和杜環有過接觸。因此，殘存的《經行記》片斷中，也有關於拂菻的記述：

拂菻國在苦國（今敘利亞地）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

所謂拂菻人膚色白裏透紅，男人穿單色衣，婦女愛好裝飾，好飲酒，食麵包，確實是東羅馬的實際情形。

杜環的經歷說明，人們只有互相接近，才能夠彼此了解。可惜他身不由己，未能繼續西行到歐洲。當時在大食的中國戰俘不在少數，《經行記》片斷中留下姓名的即有「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呂禮」等人。這些匠人把先進的中國工藝包括造紙術傳到阿拉伯，和杜環一樣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這也許是「邊庭流血成海水」的戰爭留給後世的唯一積極影響。

地生羊

即使在漢朝和唐朝那樣的盛世，中國也沒有人走出過亞洲的西界。法顯和玄奘為宗教熱情驅使往「西天」取經，他們的「西天」是印度而非歐洲。經過殘唐五代的大亂，宋朝勉強把中國本土統一起來，但是比漢唐大大縮短了的邊界一開始就不太平，國內的形勢也是緊張的時候居多，政治上總不那麼安定，國庫中也總不那麼豐盈，於是政策和統治者的心理越來越內向。「自許封侯在萬里」的陸游只能在夢裏「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而且他的故地也不過在「雁門西、

青海際」，遠沒有張騫和班超走得那樣遠，更不要說甘英和杜環了。

杜環真實的經歷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人重視，《經行記》的敷衍便可以證明這一點。在漫長的古代歲月中，人們談到遠西，多半只是一些述奇志異類的傳說，而其來源仍不出道路傳聞之一途。宋初（977—978）成書的小說故事總集《太平廣記》卷八十一《梁四公記》云：梁武帝時有四個姓名奇怪的老人來謁武帝，向「諸儒」講述西海「海中有島」，為拂菻國。「島西北有坑，盤坳深千餘尺，以肉投之，鳥銜寶出，大者重五斤。」這正是《天方夜譚》中水手辛巴德講的故事，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塞浦路斯地方主教厄皮法尼烏斯（Epiphanius，約 315—403）的書中所記：

大西提亞沙漠中有幽谷，四周有高山環之，自山頂下瞰，僅如煙霧，莫測其深也。鄰近諸國之王，多遣使來此求寶。殺羊剝皮，自岩上，下投谷中。寶石黏羊肉，岩上飛鷹嗅肉味，下投谷中，銜羊出而食之，留寶石於山頂。

這便是《梁四公記》中「鳥啣寶出」故事的來源了。

據楊憲益考證，唐宋人著作中源出歐洲或近東的故事還有不少，茲擇其尤著者列表如下：

書名	故事名	主要情節	來源於
幻異志	板橋三娘子	女巫魔法變人為畜	希臘神話中巫女 Kirhe 的故事
酉陽雜俎	洞女葉限	孤女受後母虐，得仙人助，躡仙履赴會，得國王迎娶	歐洲和近東民間產生和流傳的「掃灰娘」（「水晶鞋」）故事
酉陽雜俎	古龜茲王	一英雄有神異力，降服為害毒龍	古日耳曼神話中英雄尼伯根龍（Nibelung）的故事
太平廣記	新羅長人	海行遇風被長人擄去，以石填門，擇肥而噬，乘間得脫	希臘神話中奧得修航海遇獨眼巨人的故事

大抵在中國行人不復往西的歷史時期中，歐人之東來者仍間或有之，歐亞間經由西亞、中亞轉輸的商路亦未完全斷絕。西方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輾轉傳入中國，被喜好傳奇志異的文人記錄下來，不僅豐富了文學的內容，而且成了當時國人極其有限的世界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種「以文入史」「文史不分」的情況，在古代東方和西方都不罕見。典型的材料如有名的「地生羊」，這本來是伏爾加河流域民間傳說所謂「羊羔草」(Lamb plant)。歐洲奧德里克(Odorico)、卡爾達努斯(Cardano)、斯卡利格爾(Scaliger) 諸人均曾有記錄，大致謂此「草」種子像瓜子，長成後卻與羊無異，「有足、蹄、耳，唯無角。角處有叢毛二握而已。傷則流血。狼最喜嗜之。」(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16頁)

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時，段公路作筆記小說《北戶錄》，首次記述了傳入中國的這個故事：

大秦(即拂菻)國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國人築牆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擊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水草。

到九四〇至九四五年間，劉昫、張昭遠、賈緯等人修《舊唐書》，復「以文入史」，將其寫進《拂菻國傳》：

(拂菻)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着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

後來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1044—1060)，亦不懷疑此事之真實，照樣收入《拂菻傳》：

(拂菻)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群。

文字顯出歐陽修式的簡練，「北邑」和「不能群」卻是根據《通典》補充的。古代中國文人，當然也有瞻博認真的，但工夫往往只用在引經據典、尋章摘句上，很少對自然界的事物作精密的觀察。即使是歐陽修這樣的大作家，於此亦不免疏於格物。

明朝萬曆年間，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卷五二列有「地生羊」，說明取材於《北戶錄》，卻不問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種怪東西。其時已在段公路之後七百年，可見中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在這七百年間很少有甚麼進步。

一直到十八世紀初，康熙帝命文臣編了《淵鑿類函》。它算是以國家的名義和力量纂修的一部百科全書，仍然把「地生羊」這個純屬子虛烏有的「半植半動，亦植亦動」的怪物，記錄在《邊塞部九》裏面。

類似「地生羊」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甚至在近代地理知識傳入以後，它們還照樣在士大夫和人民中流傳着。頗為有趣的是所謂「小人國」。《通典》云：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後來來華的耶穌會士艾儒略 (Jules Aleni, 1582—1649)，「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記載多符合十六至十七世紀歐人對世界的認識水平，切實可信，而其卷二述歐邏巴洲西北海諸島，亦云：

聞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

而行。鶴鳥常欲食之，小人恆與鶴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

這究竟是歐洲的古老傳說在東西方分別流傳下來，還是西來教士援引中國談遠西的書，以迎合中國讀者的興趣呢？倒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章

自西徂東

從公元一六六年大秦始通中國算起，之後整整十五個世紀中，只見歐洲人「自西徂東」來到中國，不見中國人「自東徂西」去到歐洲^①。在中國同歐洲人員交往的歷史上，這是一個自西徂東的時代。

當然，將這一千五百年稱為「自西徂東的時代」，絕不等於說在這一千五百年中，歐洲對中國的影響超過了中國對歐洲的影響。現代西方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公元一千五百年是歐洲和世界歷史的轉折點，此前是世界影響歐洲，此後則是歐洲影響世界。同時，東西方的史學家也普遍認為：古代東方的文明程度和發展水平確實高於西方，造紙、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四大發明」便是明證。從文化思想史看，萊布尼茨和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傾倒，較之徐光啟、李之藻諸人對歐洲文化的推崇，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在向外部世界的新知識和新資源進行探索和追尋這一點上，歐洲人卻一直走在前面。這也許是使歐洲後來居上，從接受世界的影響進而廣泛影響全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① 一二八七年，伊兒汗派遣出生於大都（今北京）的畏吾兒人巴頊馬出使歐洲，這件事情很難算作一個典型的事例，詳見第三章。

馬可·波羅

歐洲人之自西徂東雖然開始得很早，但比較成批和比較頻繁地來東，則應歸因於蒙古人的統一歐亞。

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對文明地區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卻有利於中西間的交通。當時，東亞、中亞、西亞、東歐廣大的土地和人民，都在蒙古大汗統治之下。只要持有汗八里（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意為「大汗的都城」）發出一道金牌，人們便可以在亞歐大陸上通行無阻，這在過去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蒙古人在南下之前即已西征，其鐵騎數次深入歐洲，先後擊敗俄、波、德、匈諸軍，前鋒直抵維也納城下。歐籍降人和俘虜，頗有隨軍東行，轉而為蒙古政權服務的。《元史》所傳愛薛，便是一位入仕元朝的「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據張星烺先生考證，愛薛及其五子也里牙、腆合、黑廝、闊里吉思、魯合的名字，乃是 Elias、Tekoah、Hosea、Gorigos、Luke 的對音，皆歐洲基督徒常用之名。

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不必說了，在馬可·波羅（1275—1292 來東）前後來到東亞並留下了記述的歐洲人還有：

一二四五至一二四七年間，昂布里亞人皮阿諾·卡爾皮尼（Plano Carpini，舊譯柏郎嘉賓），奉教皇英諾森四世之命來謁蒙古大汗，著有遊記。

一二五三至一二五五年間，佛蘭德人魯不魯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舊譯羅伯魯），為法王路易九世所遣使者，著有《奉使始末》，又名《紀行書》。

一二八九至一三二八年間，蒙特科爾維諾的約翰修士（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舊譯孟高維奴），由教皇派至北京，主持新設置之大主教區直至逝世，有《中國書簡》。

一三〇八至一三三六年間，意大利人安德魯 (Andreas) 到中國傳教，嘗自泉州致書故鄉教士托鉢僧沃登 (Friar Warden)，原件今存巴黎國立圖書館。

一三二一至一三二八年間，波德諾內的奧德里克修士 (Odorico da Pordenone，舊譯鄂多立克、和德理) 歷遊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北京、山西、陝西、四川、西藏(?) 等地，其遊記被稱為「關於這個國家(中國)的最佳記述」。奧德里克本人與馬可·波羅、伊本·拔圖達、尼科洛·康蒂並稱為「中世紀西方四大遊歷家」^①。

一三三八至一三四六年間，小兄弟會會士、佛羅倫薩人馬里諾利 (Marignolli) 奉阿維尼翁 (Avignon) 教廷之命，到汗八里呈送國書。《元史·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年 (1342) 佛郎國貢異馬，即指此事。當時廷臣所作讚頌「天馬」的詩賦頗多，如歐陽玄《天馬頌》云：

天馬來自西方西，……七渡海洋身若飛，……

周伯琦《天馬行》云：

重譯來庭無遠邇，……使行四載數萬里。……

完全是寫實的詩句。順帝命周朗所畫「天馬圖」，康熙時來華的耶穌會士宋君榮 (Gaubil) 還曾在清宮中見到。

上述諸人，除奧德里克外，全是橫過歐亞大陸而來的，這是中西交通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可是，與馬可·波羅同時代的中國人，西行的記錄卻大為遜色。

① 奧德里克遊記，清季留學意大利的中國天主教修士郭棟臣曾將其譯為漢文，名《真福和德理傳》，由武昌崇正書院刊行。

耶律楚材（漢化的契丹人）一二一八年奉詔赴成吉思汗行在，寫了一本《西遊錄》，所記行蹤止於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地。

長春真人丘處機一二二〇至一二二三年西遊講道，率李志常等弟子從山東出發。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錄》，記述他們一行從撒馬爾罕南渡阿姆河，「見大雪山而還」。

元憲宗（蒙哥大汗）九年（1259），常德被派往伊兒汗旭烈兀處，隨員劉郁著有《西使記》，其一行亦不出波斯國境。

而另一方面，在遼、金、西夏、蒙古相繼控制通往中亞和西亞的陸路以後，中國東南海上的交通和貿易，卻慢慢地發展起來。南宋末年，福建泉州已經有了像蒲壽庚那樣擁有海舶數十艘的航海巨商。《馬可·波羅行紀》記泉州（他稱之為 Zayton，譯作「刺桐」）互市的盛況云：

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①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言，亞歷山大（Alexandrie）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據馮承鈞譯本）

雲集泉州的大批船隻，當然多數只來往於中國東南各港，但其中確實也有的是來自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南宋時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記述了一些關於大秦、斯加里野（西西里）、蘆眉（羅馬）的事情，其來源亦不外乎從海舶得到的傳聞。直到元時，汪大淵「兩附船東西洋而遊」，才算留下了一部多少算是紀實的《島夷志略》。但汪的航程最遠只到印度西邊的阿拉伯海。書中言甘埋里國

① 馬可·波羅按照蒙古人的習慣，將中國南方居民稱為「蠻子」。

「與佛朗相近」。「佛朗」和劉郁《西使記》提到的「富浪」，皆為 Farang 之對音，亦即波斯人對歐洲的稱呼。汪大淵和劉郁雖然西行到了聽說有個佛朗（富浪）的地方，仍然沒有真正走到佛朗或富浪去，親眼看看那裏是甚麼模樣。

因此，在整個蒙古征服時期，儘管歐人西來不絕如縷，而中國無論在陸上或在海上，比杜環和甘英走得更遠的人，史書上卻沒有見到甚麼記載。

「下西洋」

蒙古帝國瓦解後，歐亞間的陸上交通隨之中斷。繼元朝而起的明朝，統治從一開頭就不那麼穩固，因此對外部世界比過去更加防範和猜疑。明太祖大殺功臣，總喜歡給被殺的人扣上一頂「通高麗」或「通日本」的帽子，實際上當然並無其事。洪武二年（1369）頒佈的《皇明祖訓》，將一十五個遠近國家列為「不征之國」。所謂「不征」，其實就是不惹和不理的意思，不過偏要擺出一副「天朝上國」的架子那麼說罷了。

這一十五個國家，大概也就是明太祖所知道的全部外國（西北邊外的幾個敵國在外）。其中包括了朝鮮、安南、日本，還有一個所謂「西洋國」。在日本名下，御筆親批：「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所謂「絕之」，便是要斷絕關係，尤其是不能允許臣民和它往來。

洪武十四年（1381），嚴禁近海民人製造三桅以上大船下海前往外國買賣，「正犯比照謀叛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建文四年（1402）成祖即位，登極詔書中又重申海禁。永樂元年（1403），並下令將原有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使之無法航行大洋。

但在厲行海禁的同時，國家卻又有遣使之舉。初看起來，這裏似

乎存在着矛盾。但如果稍加研究，我們即可發現，明初遣使純粹是出於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而絕不是對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適應。所以，皇家雖能派人泛海，百姓卻被嚴禁出洋。幾次遣使，包括被宣傳得簡直有些過分的「三保太監下西洋」（1405—1433）在內，都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當時封閉社會的性質。

明太祖派人到爪哇、三佛齊、淳泥、瑣里，是為了「宣揚國威」。成祖的使臣遠達撒馬爾罕、塔什干、阿富汗，以及鄭和七下西洋，是為了鞏固皇位。《皇明四夷考·序》說得好：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

所謂「國有大疑」，就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史·鄭和傳》）。正因為這件事情是成祖個人意志的產物，所以御駕一崩，馬上有人反對再幹。《殊域周咨錄》所載劉大夏之言曰：

三保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

於是仁宗即位之日便立即宣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

有人不明白何以「下西洋」要派一個十歲就閹割入宮當太監，又是西域人後裔、回教徒的鄭和，殊不知當時皇家的秘密差使，原是不能交給有廣泛社會聯繫的「外臣」執行的。

明代所謂「西洋」，實指南中國海及迤西之印度洋。《明史·婆羅傳》：「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便說明了這一點。鄭和「下西洋」，最遠曾航達阿拉伯半島南端及非洲東部索馬里一